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 外宣翻译研究

A Study on Translation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al Persuasion

袁卓喜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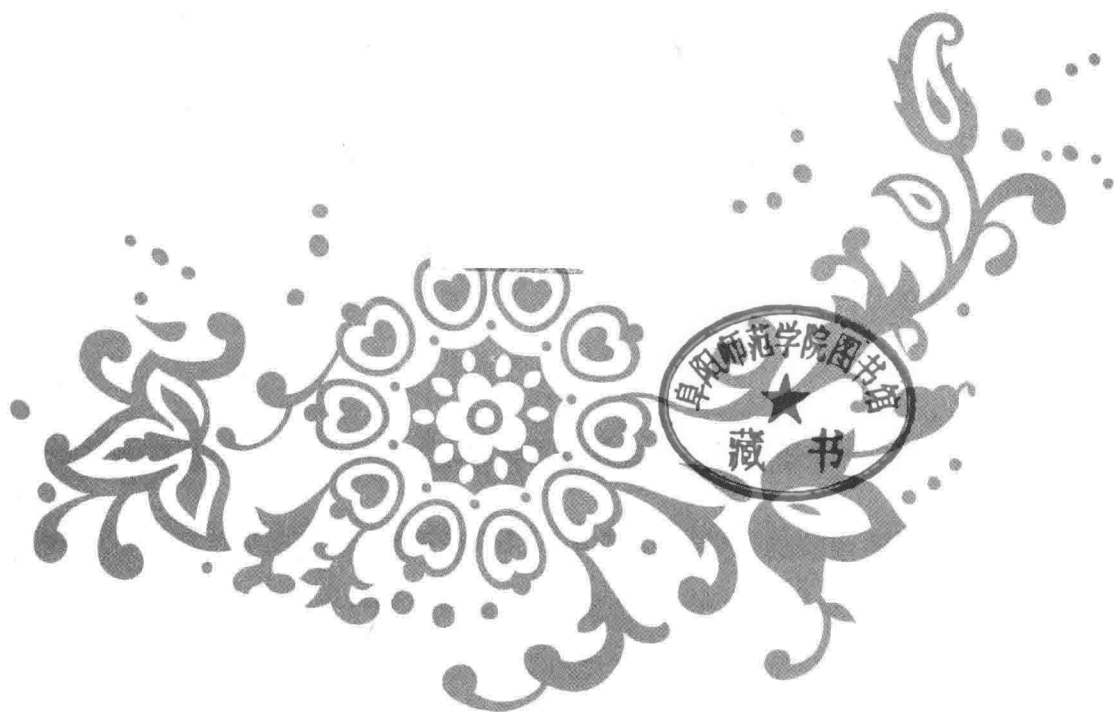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 外宣翻译研究

A Study on Translation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al Persuasion

袁卓喜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 袁卓喜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657-1877-9

I. ①修… II. ①袁… III. ①对外政策—宣传工作—语言翻译—研究—中国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4223 号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XIUCI QUANSHUO SHIJIAOXIA DE WAIXUAN FANYI YANJIU

著 者 袁卓喜
策划编辑 蒋 倩
责任编辑 蒋 倩 李 明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877-9/H · 1877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近闻袁卓喜博士的书稿《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行将出版，嘱为之序，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写序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

袁博士是我的同事，平日喜欢和我谈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且对于修辞学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的探讨，大约始于十年前。那时，我的第一部西方修辞学理论专著才刚面世不久。那本书是我十年磨一剑，对西方修辞学尤其是当代西方修辞学的调查研究的所得。期间我曾留学美国，到复旦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来又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的都是西方修辞学。当时国内对西方古典修辞学尚有些了解，但对当代西方修辞学就不甚了了了，因为以往流传进来的信息不多。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袁博士与我谈起了西方修辞学。及至后来，他的博士论文也在修辞学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西方修辞学传入我国已有百年历史。但相对于同样是引自国外的其他学科来说，我们对其发展变化了解得太少

了。因此说到这个学科,学术界不少人都以为它与中国传统的修辞方法大致相近,也就是教人如何写作,或者是早已司空见惯的辞格研究。加之20世纪初,恰逢西方修辞学的衰落时期,传进我国的有限的几本修辞学著作皆为修辞—作文教科书,于是这个看法更得到了肯定。更有甚者,把西方修辞学等同于诡辩论。在一个“修辞立其诚”的文化中,这种外来的修辞学身份尴尬,受人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可见,百年间国人对西方修辞学的认知有很大的局限性。

传统上西方古典修辞学是研究演说论辩的,以劝说为核心,确有诡辩的色彩。但诡辩并不是修辞的目的,也不是学科内容,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早已有所明示。修辞学自诞生之日始,就是为满足社会文明发展需要而兴起的一门学问。早在古希腊时期,伊索克拉底就在雅典创办了一所修辞学校,传授演说论辩知识,把演说者的公共生活行为作为理想。当时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在西方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修辞学都是学校的必修课,是学生走向社会取得成功的敲门砖,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演说论辩是公共话语交流的常见形式,与社会舆论的运作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自古以来,修辞劝说在西方社会一直大行其道,大大小小的选战、形形色色的演说,都是修辞活动的传统领域。不论是社会舆论的运作、政府领导人的产生,还是政策的制定、社会的管理,修辞活动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本书的指导思想是把西方修辞学的劝说理论引入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之中,可见这是有深厚的理论根据的,与西方的修辞实践也是融为一体的。

本书的特色是针对外宣翻译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把外宣翻译理论与修辞劝说理论结合起来,为外宣翻译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以增强我国外宣翻译的宣传效果。作者梳理了修辞劝说理论,找到了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点,探讨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启示,提出了外宣翻译的策略构想。全书思辨清晰,顺理成章。更为难得的是,作者以修辞劝说为工具,对外

宣译例分门别类地进行剖析,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最后,全书展现出来的全球化视野不无启迪,值得我们注意。

当代西方修辞学理论已经证明,人是修辞动物,修辞活动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修辞学融汇在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中,一切需要劝说和沟通理解的场合都离不开修辞。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修辞学历经 2000 多年的发展,已经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生根,成了一种固有的模式、一种文化印记。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之间交汇融合,话语交流成为相当重要的沟通手段。大凡是正常的话语交流,都会遵循一定的修辞轨迹,或者叫修辞模式,大至民族国家,小至群体个人,概莫能外。要想在国际社会话语交流的舞台上做到进退自如,取得理想效果,不了解西方话语交流的修辞方式是不行的。最近有一句流行语,叫作“用外国人喜欢听、听得懂的话讲述中国故事”,大概就是修辞方式最为通俗的写照。袁博士的著作不论对翻译工作还是外宣工作来说,都是相当有启示意义的,希望能引起外语界同行以及有关方面的普遍关注。

是为序。

温科学

2016 年元旦于广西大学

前 言

作为国家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和环节,对外宣传翻译一直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相应地,外宣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研究由最初的经验总结式探讨发展到尝试引入翻译与传播学相关理论来探讨外宣翻译的策略问题,成果颇丰。而前者主要由外宣翻译工作者通过自身多年外宣翻译工作经验总结出有关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和翻译策略问题。沈苏儒、段连城、赵启正等老一辈从事外宣工作的专家、学者等提出了有关外宣翻译原则和策略,如“内外有别”等原则。近年来,外宣翻译中借鉴相关理论的研究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学者们尝试将功能目的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关联理论、构建主义理论以及传播学理论等引入外宣翻译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广泛讨论了外宣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尚有以下不足之处:(1)相关研究集中讨论外宣翻译与一般翻译的共性原则,而往往忽视

外宣翻译的特殊性,对译文的交际与说服效果关注较少。(2)相关研究对外宣目标受众的研究不够,特别是对受众所信服和认同的劝说模式了解不足。作为一种带有明确劝服目的的对外传播活动,外宣翻译预期效果的实现离不开对外宣目标受众的了解和研究。而当前外宣翻译研究尚停留在认识到“受众的重要性”的层面上,对打动受众的劝服机制研究还鲜有触及。可见,目前外宣翻译研究尚滞后于我国外宣工作的实际需求,亟待引入新的理论视角,以探寻更好地实现国家对外宣传预期目的的外宣翻译原则与策略。从这一点出发,本书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对外宣翻译进行研究,为其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视域,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而成的。书稿交付之际,特别要表达我对一直以来关心和鼓励我学术求索的师长和亲友的感激之情。

首先要特别感谢我的恩师张健教授。张老师学养深厚、治学严谨、为人谦逊,在外宣翻译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几年前在上外读博期间,张老师在注重加强我们理论学习的同时,也十分强调我们要从翻译实践中验证和提炼外宣翻译理论。为了便于我们理论结合实践,促使我们对外宣翻译问题进行思考,张老师还特意定期给我们提供外宣翻译实践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领悟最深的就是外宣翻译研究离不开来自翻译实践的思考,而理论的适用性也需要回到翻译实践中去检验。本书稿付梓前正值张老师多重事务缠身之际,加之交稿期限较紧,所以张老师未能为本书出版写上鞭策之词,但他在电话中再三勉励,对本书即将出版甚感欣慰。在求学及研究过程中,张老师给予我关心、帮助和鼓励,在此我深表感谢。

另外,还要感谢修辞学界知名学者、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温科学教授的鼓励和支持。十年前,我便有将修辞劝说理论引入外宣翻译研究的设想,当时与温老师交流了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温老师的认同和鼓励。之后无论是有关这一视角研究的论文撰写还是博士论文撰写,我和温老师都有过深

入的探讨,并从温老师处得到了一些国内尚难以找到的西方修辞学资料。其后,无论是在我主持的省、厅级社科研究项目中,还是在我近期获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温老师都以作为项目组的核心成员的方式支持我在翻译与修辞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工作。温老师的不吝帮助不仅增强了我将这一理论视角引入外宣翻译研究的信心,而且使我得以从一个新的、更为宽广的视角思考和审视外宣翻译问题。在此,特别要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胡曙中教授、冯庆华教授、梅德明教授、陈坚林教授、谢天振教授、史志康教授等。读博期间,他们的课堂讲座及学术沙龙使我深受启发。

我还要感谢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领导和同事们,以及南宁市政府门户网站外文网翻译项目的同事们。外院是温暖的大家庭,是我成长的摇篮。感谢他们在我读博求学期间和学成返校后的工作中所给予我的帮助和关怀。

感谢本书引用的所有资料和文献作者,他们的成果是本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养分。特别要感谢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陈小慰教授,她是国内首位系统地将修辞学视角引入翻译研究的学者。本研究成果的获得也得益于她的学术思想的滋养。

承蒙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温科学教授拨冗为本书作序。温老师是国内修辞学领域的大家,在西方修辞学和中西修辞对比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同时,温老师在翻译学与话语传播研究方面也有较深造诣。他的序言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此深表感谢。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蒋倩、李明编辑认真严谨的编辑工作。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优势特色专业(群)——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外语翻译专业群”建设项目为本书的出版提供资助。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她们对我的爱和支持是我学术追求的动力源泉,我的每一点进步都与她们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无论是在

我读博期间,还是在我开展项目研究工作和书稿撰写期间,妻子都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工作,为我创造了一个可以平静地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环境。相信本书完稿付梓是对妻女的爱和支持最好的回报。

袁卓喜

2016年2月于广西大学东高寓所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 第一节 本书缘起 / 1
-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4

第一章 外宣翻译研究概述

- 第一节 外宣相关术语的概述与厘定 / 9
 - 一、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 / 9
 - 二、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 / 11
 - 三、翻译与外宣翻译 / 13
- 第二节 外宣翻译的研究视角概述 / 16
 - 一、实践经验总结研究路径 / 16
 - 二、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研究视角 / 18
 - 三、语用学理论研究视角 / 20
 - 四、功能目的理论研究视角 / 23
 - 五、其他外宣翻译研究视角 / 25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29

第二章 外宣翻译研究的局限与修辞劝说理论引入外宣翻译研究的理据

- 第一节 外宣翻译研究尚存在的缺失与局限 / 31
 - 一、外宣翻译的效果评估 / 31
 - 二、外宣翻译的“宣”与“译”的定位 / 33
 - 三、外宣翻译的受众接受心理研究 / 35
 - 四、译者主体性的能动发挥 / 36
- 第二节 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共性 / 38
 - 一、外宣翻译和话语修辞均以沟通与劝说为目的 / 38
 - 二、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凸显受众的中心地位 / 40
 - 三、外宣翻译与修辞研究均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 / 41
 - 四、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关注语境的因素 / 43
 - 五、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属言语交际行为 / 44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46

第三章 外宣翻译研究的修辞劝说视角——修辞劝说理论溯源

- 第一节 修辞劝说的经典理论:亚里士多德修辞诉诸三模式 / 48
 - 一、诉诸修辞者人格(ethos) / 49
 - 二、诉诸受众的情感(pathos) / 50
 - 三、诉诸论证理性(logos) / 52
- 第二节 修辞劝说的核心因素:受众 / 53
- 第三节 修辞论辩的运作机制:选择、在场与交流 / 56
- 第四节 修辞劝说的中心概念:“劝说”与“认同” / 58
- 第五节 修辞话语产生的基础:修辞情境 / 61
- 第六节 广义修辞学之“双向交流”与“预设” / 65

第四章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启示意义与策略构想

第一节 修辞劝说理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新认识 / 69

一、外宣翻译实践:服务国家外宣的话语建构行为 / 69

二、外宣译者:信息传递者、国家修辞建构的参与者 / 72

三、外宣翻译过程:修辞主体的三元互动过程 / 73

第二节 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的启示 / 78

一、运用修辞诉诸手段,增强外宣译文的劝说效果 / 78

二、以目标受众为中心,提高外宣译文的可接受性 / 82

三、应外宣翻译情势,适当地选材、择语与谋篇 / 86

四、在翻译中建立“认同”,实现外宣译文的有效劝说 / 89

五、选择性地构建“在场”,塑造真实、正面的国家形象 / 93

第三节 基于修辞劝说理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构想 / 97

一、外宣翻译的任务与目的:知之、好之、同之 / 97

二、外宣翻译的原则:忠诚、求效、适切 / 101

三、外宣译文话语建构中的修辞运作:觅材、择语、谋篇、创新 / 11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122

第五章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外宣翻译译例分析

第一节 新闻外宣翻译——以地方政府政务英文网新闻翻译为例 / 125

一、新闻翻译与地方政府政务新闻翻译的定义与特点 / 126

二、修辞劝说视角下地方政务网站对外新闻翻译的目的与原则 / 128

三、地方政务网站对外新闻翻译的译材选择 / 130

四、修辞劝说视角下地方政务网站对外新闻翻译的译策选择	/ 135
第二节 外宣资料翻译——以对外推介性文本英译为例	/ 146
一、对外推介性文本的特点与功能	/ 146
二、推介性文本外宣翻译中修辞风格的适应与调整	/ 147
三、推介性文本外宣翻译中诉诸手段的选择与运用	/ 150
第三节 典籍外宣翻译——辜鸿铭儒经翻译的修辞劝说视角解读	/ 154
一、文化外宣翻译背景下的典籍翻译	/ 155
二、辜鸿铭儒经翻译动机的修辞情境理论视角解读	/ 157
三、辜鸿铭儒经翻译译策选择的修辞劝说视角解读	/ 159
四、辜鸿铭儒经翻译的修辞解读对典籍外译的启示	/ 16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166

参考文献	/ 167
------	-------

绪 论

第一节 本书缘起

习近平主席早在 2013 年 8 月 19 日—20 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便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①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期对外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使命，指明了新的方向。此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也于 2013 年 5 月 8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人要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的文章，提出对外宣传与交流工作不仅需要努力让外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真切的认知，也需要我们中国人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以便使不同视域下的中国形象得

^① 参看中国新闻网的相关报道，http://news.china.com.cn/2013-09/04/content_29923662_2.htm。

以逐渐融合。^① 该文章被国内各大主要网络媒体转载,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已经进入公共外交时代,如何有效建构自己的话语权、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前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国新办主任赵启正的解释,“中国故事”指由中国人讲的与中国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这里强调的是为了达到传播的有效性,让对方听到并且听进去,就要学会以故事的方式对外沟通,而不能仅靠政策、规章的传播(赵启正,2011:22)。然而,由于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的制约,因此,外宣翻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外宣翻译的质量如何是我们能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因素。本书的撰写初衷也基于此。

作为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和环节,对外宣传翻译一直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目前,涉及对外宣传翻译的研究主要沿着两大路径展开:一为经验总结式;二为理论借鉴式。前者主要是由外宣翻译工作者根据自身多年外宣翻译工作经验总结出的有关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和翻译策略,如沈苏儒、段连城、赵启正等老一辈从事外宣工作的专家、学者等提出的有关外宣翻译原则和策略;如“内外有别”等原则。另外,黄友义先生所提出的“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对外宣翻译工作也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近年来,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尝试引入新理论视角的趋势很明显。从中国知网中文数据库(CNKI)查询统计来看,学者们引入外宣翻译探讨的理论视角主要有功能翻译理论、交际翻译观、跨文化交际理论、关联理论、构建主义理论、顺应论及传播学理论视角等。学者们引入这些理论视角是对如何提高外宣译文质量进行的有益的探讨,以及就外宣翻译应当遵循何种原则和选择何种翻译策略等问题展开的深入的讨论。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其中包括外宣译者应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对外宣译文进行必要的操控,以便更好地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已经进入公共外交时代,需要更好地走向世界,而世界

^① 参看新华网的相关报道,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3-05/08/c_124678135.htm。

也有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需求。在新形势下,外宣工作在促进中外沟通与交流,展示我国友善、热爱和平的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维护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及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等工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凸显了外宣翻译的重要地位。我国外宣翻译界老专家、老前辈爱泼斯坦、林戊荪和沈苏儒(2000:2)曾郑重呼吁重视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他们在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外语是决定外宣效果的最直接的因素。我国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公共外交领域的领军人赵启正先生在其力作《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批评了“懂外语就能翻译”的认识误区,指出“翻译”水平问题不仅影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甚至还制约了中国的国际政治表达(赵启正,2011:110)。可以说,外宣翻译工作的质量将影响我国对外宣传的效果。由此,外宣翻译工作是否有成效也将对国家对外交流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2012年11月24日—25日举办的以“国家形象、社会发展与修辞学的使命”为题的中国修辞学学术研讨会上,我国“修辞象征研究”最有力的倡导者刘亚猛教授作了《会说的国家与不会说的国家效果确实不同——修辞的宏观维度及其对当代中国修辞语境提出的挑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中国修辞学者应该努力促成中国跻身“会说话的国家之列”。^① 赵启正先生也提出了“国家修辞”与“国家话语力”的概念,认为在国家实力一定的前提下,国家修辞可以增强国家的话语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际舆论(赵启正,2011:96)。而国家修辞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传播的语言运用,对外宣传翻译在其中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扭转外宣效果与其投入严重失衡的困境,刘亚猛教授曾呼吁我国外宣翻译工作者要提高自己的修辞意识,要善于对完全不同的受众使用完全不同的说服手段,要充分认识到外宣翻译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一种“再构思”“再表达”,是一种“重构”的过程(刘亚猛,2004:19)。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外宣翻译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翻译的共性研究上,对

① 转引自付伊、翁晓玲:《国家形象、社会发展与中国修辞学的使命——中国修辞学会2012年学术研讨会述评》,《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1期。